“埃里温路径”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校准方向

新华社埃里温10月31日电(记者郭爽 张超群 刘书辰)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称《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原定于10月30日闭幕,由于分歧难消,最后一场全会持续约12个小时。10月31日上午,大会主席汉巴尔祖姆·马捷沃相宣布大会闭幕时,会场爆发掌声。

两年前在哥伦比亚卡利举行的COP16大会,正是因为拖到代表纷纷离场、达不到法定人数而被迫中止,各缔约方数月后才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续会上达成共识。这一次,所有主要文本都在埃里温大会上获得通过。马捷沃相说:“我现在还不能说COP17有多成功……但那些最受期待的议题,我们都推动通过了。”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阿斯特丽德·肖梅克评价说,这次大会“在多边主义据说已失灵的时刻,取得了不起的成果”。

确定“路径”

本次大会的核心任务,是对“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称“昆蒙框架”)落实情况开展首次全球集体进展审查。会前汇总的全球报告并不乐观:23项2030年目标中,大部分进展落后。如今,近200个缔约方通过多项决定,画出了一条通往2030年的“埃里温路径”,让世界在“昆蒙框架”半程节点上努力重新校准方向。

“埃里温路径”不是一份单独的文件,而是大会所通过的全球审查决定中关于下一步该怎么办的相关内容。它不设新目标,只回答一个问题:与既定目标有差距,怎么追回来。

肖梅克在闭幕发言中说:“我们加快脚步,完成全球报告,明确了差距,通过‘埃里温路径’。现在我们需要沿着这条路走向2030年。”

全球审查决定中说,大会深为关切地注意到,除非各方迅速加快协同落实行动,2030年目标“将无法实现”,2050年目标也“可能面临风险”。大会敦促各方加快落实“昆蒙框架”,同时承认需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大会为未来4年确定了重点——加快行动、扩大国家目标覆盖面、加强实施手段、推动政府整体参与、推动全社会参与、加强监测与知识体系建设。

会场之外,资金也在累积。据《公约》秘书处统计,会期内有关方面宣布新增资金近20亿美元,增资渠道包括全球环境基金、物种恢复联盟等。

道阻且长

掌声是真的,难题也是真的。

最主要的难题还是资金。全球报告确认一个事实:发达国家没有兑现到2025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200亿美元的承诺。与会代表指出,多边环境援助供给承压,全球环境基金有关项目2026年至2030年增资周期的资金规模较上一期下降了27%。

但在埃里温,资金谈判的焦点却被引向另一个方向:一些发达国家推动“扩大出资国范围”,试图逃避自身义务。

《公约》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提供”新的额外资金,其他国家“可以自愿承担”相应义务。总部位于马来西亚的国际组织“第三世界网络”专家林丽珍说,要求他国“承担发达国家义务”是“赤裸裸的虚伪”,“没有考虑历史责任与当前责任的归属”。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议题在本次会议上没有走完程序。大会主席宣布,关于合作、战略审查等项目,将被推迟审议。

“每一个被稀释的条款、每一个被推迟的目标,都是朝着不可逆转的损失迈出的一步。”世界自然基金会专家吉多·布鲁克霍芬在闭幕前的记者会上说。



2026年10月29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恢复日”活动上,“中国蓝湾行动”获评“世界生态恢复旗舰项目”。新华社记者陈俊锋摄

肖梅克表示,关键不在于各国代表团在埃里温达成了什么,而在于他们回国后改变了什么。

中国贡献

“昆蒙框架”源于2021年在昆明开幕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中国的作用在本次大会中被多方提及。全球审查决定文件中专门感谢中国政府主办“昆明对话会”,为本次全球审查提供支撑。文件同时提及,中国信托基金为本次全球审查以及相关全球报告的编制提供资金支持。

马捷沃相在大会期间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从会前准备到正式谈判,中国为推进本次大会谈判作出重要贡献。

肖梅克说,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为世界提供宝贵启示,“没有一种模式适用于所有国家,但中国的经验表明,将雄心勃勃的承诺与扎实的科学基础、有效的制度和长期投入相结合十分重要。”她表示,中国最新提交的国家报告所反映的进展令人鼓舞,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是将保护融入国家规划与发展的范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近日发表声明,肯定中国继担任COP15主席国之后在设立“昆明基金”方面的持续引领。马捷沃相在大会期间对记者表示,这一基金对于亚美尼亚意义重大。

从昆明到埃里温,“昆蒙框架”走过一半路程。这次大会或许没有满分收官,但为前路校准方向。道阻且长,但路已指明,行则将至。

文化专栏·杨德盈

中唐南巴县尉刘长卿(上)

编者按

一方水土,沉淀千年文脉。古高凉电白山海毓秀,代有贤才。本土作家杨德盈耗费数十年心血,钩沉史籍、梳理谱牒,潜心撰成本土文化系列文章。

本系列叙写唐宋以来乡邦先贤事迹,打捞方志族谱里的尘封往事,溯源地域文化根脉,重温先贤风骨,赓续高凉崇文重教薪火。本报即日起连载,敬请读者垂注。

刘长卿(约726—约790),字文房,世称刘随州,相传“五言长城”,是中唐诗坛举足轻重的大家,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人。他与钱起并称“钱刘”,同为大历诗风的核心代表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刘长卿是承盛唐余韵、开启中唐诗歌新格局的关键诗人,一生诗作五百余篇,五言尤冠绝一代。而贬谪岭南潘州南巴三年,不仅是他个人仕途最坎坷的一段经历,更是粤西大地载入大唐诗史的标志性事件,让南巴古县得以跻身唐代贬谪文学的重要地理坐标,这便是这段历史,能跨越千年的核心价值。

刘长卿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浸习经籍,才思敏捷,少年隐居崇阳,潜心攻读,预备科考。然科举之路曲折,屡试而不辍,终在唐天宝八年(749年)登进士第,授陈留浚仪县尉,官阶从八品。古陈留,即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陈留镇,自古为郡国县治,文脉厚重。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安史之乱席卷中原,天下动荡,刘长卿流落江南,先后出任长洲县尉、代理海盐县令。他秉性刚正,守直持正,不肯曲意依附权贵,因而两次遭人罗织诬陷,两度迁谪,先贬南巴县尉,后贬睦州长史。乾元元年(758年),在远赴南巴贬所的漫长旅途之中,他沿途与郑校书、李嘉祐、李白等一众诗坛友人酬唱赠答,诗卷往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千载流传的文坛佳话。

潘州南巴,依历代史志文献、实地遗址考证,古县治就在今茂名市电白区麻岗镇南巴中学校址,今茂名市电白区麻岗中学,用地面积达二百零五亩。南巴自南朝立郡,隋唐设县,是唐代潘州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县邑,控扼粤西滨海要道。在唐代,岭南属于中原士人眼中的荒远瘴乡,贬谪至此,是很重的政治处分。刘长卿以从八品县尉在此谪居三载,这段经历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一位诗人的个人遭际。他以中原士大夫的视角,用诗歌记录唐代岭南的山川风物、边地人文,把南巴之名写入《全唐诗》,也为粤西留下最早、最经典的唐代文人诗篇,填补了粤西唐代文学的史料空白,也印证了南巴坡古县城的历史地位,成为地方文史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秋,刘长卿踏上远赴南巴贬所的漫漫长路。蒙冤远贬,前路苍茫,心中郁结不平,途中写下第一首五言律诗,题为《赴巴南书情寄故人》,收录入《全唐诗》卷一百四十七。

原诗如下:

南过三湘去,巴人此路偏。
谪居秋瘴里,归处夕阳边。
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
裁书欲谁诉,无泪可潸然。

这首纪行诗,是刘长卿踏上岭南贬途的第一篇心声。安史之乱,世道倾颓,正直之士蒙受冤屈。诗人一路南行,穿过三湘,走向荒僻的南巴。想到自己将要谪居于瘴雾弥漫的南国,归期渺茫,坚守正道却蒙难,一腔委屈无处倾诉。此诗不只是个人的悲叹,更是在安史之乱的背景下,一代正直文人在乱世之中遭遇诬陷、命运浮沉的时代缩影,具备很高的史料与文学双重价值。

刘长卿赴潘州南巴途中,途经鄂州,与旧友相逢,写下第二首七言律诗,题为:《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干越亭赠郑校书》。

原诗如下:

青青草色满江州,万里伤心水自流。
越鸟岂知南国远,江花独向北人愁。
生涯已逐沧浪去,冤气初逢涣汗收。
何事还邀迁客醉,春风日夜待归舟。

诗题所记鄂州,州治设于江夏县,即今武汉市武昌蛇山一带,和现代湖北鄂州市并非同一地方。这首七律写于贬谪南巴时,是刘长卿与郑氏故友校书郎于干越亭相逢所作。同一时期,他还写下五言排律诗,题为:《负谪后登干越亭作》。

原诗如下:

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
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
生涯投越徼,世业陷胡尘。
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春。
秦台悲白首,楚泽怨青蘋。
草色迷征路,莺声伤逐臣。
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
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
牢落机心尽,谁怜鸥鸟亲。